

● 文学研究

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中“聚和性” 与民族主流价值观的同构*

萧净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州 510420)

提 要: 俄罗斯文学经典是俄罗斯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书写及其民族精神的艺术写照, 它深深根植于俄罗斯文化传统, 具有超时空性。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创作中, “聚和性”意识与俄罗斯民族主流价值观的同构得到有力的彰显。这一同构作为俄罗斯文学与社会现实对话的产物, 其内涵与实质是对人文传统的关注与承袭。而对人性的书写与评判、文化自觉和“弥赛亚”信念分别构成其方法、精神根基和精神诉求。分析这一同构对于我们今天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俄罗斯文学经典; 民族主流价值观; 同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化自觉; 精神诉求

中图分类号: I1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8)06-0117-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8.06.021

The Isomorphism of Sobornost Doctrines and Russian National Mainstream Values in the Russian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19th Century

Xiao Jing-yu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The Russian literary classics are the writing of the Russian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artistic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spirit of Russia. It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Russian cultural tradition and is of transcending time and space.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there's obvious isomorphism between Sobornost Doctrines and Russian national mainstream values in the Russian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isomorphism is the product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Russian literary classics and social reality, the essence of which is paying attention to and inheriting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And writing and judging human nature is its method, whil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s its spirit root and Messiah is its spiritual pursuit. The analysis of this isomorphism is instructive nowadays for us to promote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Russian literary classics; national mainstream values; isomorphism;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spiritual pursuit

关于对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的理解,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Бахтин М. М., 1895-1985)曾提出“长远时间”的概念,“相隔几百年、几千年之久,各国人民之间,各民族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保证了整个人类,人类所有各种文化的复杂的统一(人类文化的复杂的统一),人类文学的复杂的统一。所有这一切只能在长远时间的层次上才

能揭示。每个形象也只能在长远时间的层次上才能理解和评价”(巴赫金 1998: 387)。所以,“文学作品要打破自己时代的界线而生活到世代代之中,即生活在长远时间里。而且往往是(伟大的作品则永远是)比在自己当代更活跃更充实”(同上: 366)。从这个意义上看,真正伟大的作品都是经过若干世纪文化的酝酿才创作而成。文学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研究”(15ZDB092)的阶段性成果。

经典之所以堪称经典正是因其根植于伟大的传统中并超越自己的时代,而且继承传统并放眼未来。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雨果、俄罗斯的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伟大作家均是如此。

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不同程度地闪烁着“聚和性”(соборность)之光。“聚和性”作为俄罗斯传统哲学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最早由斯拉夫派领袖霍米亚科夫(Хомяков А. С., 1804 - 1860)提出。通过这一概念,他不仅强调人们“多样性中的统一”和“自由的统一”,以表明俄罗斯东正教精神与基督教新教“没有统一的自由”和与天主教“缺乏自由的统一”的本质区别,而且弘扬一种超越个体、由内向外的精神和谐。

实质上,“聚和性”基于无私的奉献精神 and 爱,是“精神上的有机统一而非外表上的彼此联结。在该统一体内部,每个个体保有自身的个性和自由”(Миненков Г. Я. 1998: 630)。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自由并非随心所欲,而是以自律为前提。哲学家洛斯基指出,聚和性意识“只有在个人自愿服从绝对价值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只有个人拥有建立在对整体、教会、自己人民和国家的爱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洛斯基 1999: 78)。它宣扬一种博爱、宽恕、团结的精神,这是与长久以来俄罗斯民族主流价值观一致的精神性要素。这种精神要素直接影响俄罗斯文学创作,并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经典中集中体现出来。

俄罗斯文论家叶萨乌洛夫(Есаулов И. А., 1960 -)在《俄罗斯文学中的聚和性范畴》一文中指出,俄罗斯文学是从作品出发的,而作者总是旗帜鲜明地宣称精神的两极和人的两种价值取向:法律与神性。哲学家霍鲁日(Хоружий С. С., 1941 -)指出,神性作为“聚和性”的源泉并非其特征之一,而是哲学术语中“聚和性”的本体论前提(Хоружий С. С. 1999: 92)。叶萨乌洛夫认为,霍鲁日关于“聚和性”的观点远远超越“纯粹”神学和哲学,包括俄罗斯文学在内的整个俄罗斯文化(Есаулов И. А. 1995: 36)。他们的观点也许过于偏颇,却不无道理。的确,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的创作始终与“聚和性”有着不解之缘,不同程度地显现出“聚和性”意识与俄罗斯民族主流价值观的同构。

1 对人文传统的关注与承袭:同构的内涵与实质

任何经典都具有超时空性,但文学经典的产

生是一个文本认知的过程,也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书写和民族意识的反映。按照巴赫金的观点,伟大的作品都活在“长远时间”里,因而我们不应囿于作品的同一时代来理解文学和文化现象,也不应在短暂的时间和狭窄的空间里来理解和评价作品。任何作品都是对它们所处时代的反映,而其意义往往可以高于现实,这恰恰是因其闪烁着某种传统之光而为读者超越时代的解读提供可能。俄罗斯文学经典是对具体的俄罗斯社会文化历史语境的反映,所以不可避免地要与文本内部结构之外的因素,如文化传统、历史背景、民族意识和作家意识等发生关联,从而呈现出各自独有的面貌。然而,对俄罗斯人文传统的关注与承袭是其共同的特征。

俄罗斯人文传统有独特的民族性根源。这一民族性包括以人为中心的传统、“聚和性”意识所倡导的博爱宽恕、斯拉夫派的爱国激情、俄罗斯思想家丘特切夫所总结的“用理智无法理喻”和“对信仰有着特殊偏好”(Бердяев В. Н. 1990: 5)的特点以及喜爱“精神漫游”而轻视理性的性格,等等。它们与俄罗斯文学经典的创作互为源泉,相辅相成。俄罗斯思想家弗兰克(Франк С. Л., 1877 - 1950)指出,“很难说出有另一个民族像俄罗斯民族一样,其19世纪全部文学多是讨论宗教问题。所有伟大的俄国文学家又是宗教思想家或寻神论者。果戈理晚期创作如此,悲剧性的莱蒙托夫亦然,不为西方所知的大师丘特切夫同样,为西方所知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深知人民宗教性的列斯科夫更如此。民粹主义专家格列勃·乌斯宾斯基也是这样,他出色地描述了农民心理,而在自觉世界观上他是非教徒,却有内在、深刻的宗教性。甚至‘俄国的歌德——天才的普希金在某些深刻的诗作中也表现出宗教悲剧主义和热烈信仰。俄国也许是唯一到了19世纪还出现圣徒的欧洲国家’(弗兰克 1999: 31 - 32)。

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创作中体现出的“东正教王国的强烈的民族性”(Бердяев В. Н. 1990: 146 - 165)、爱国主义和“聚和性”意识观照下的精神救赎与复活的主题最为典型,这些是俄罗斯民族主流价值观的重要构成元素。通过对俄罗斯人文传统的关注与承袭,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经典实现“聚和性”意识与它的同构。

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Пушкин А. С., 1799 - 1837)开创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东正教精神恰恰是他创作的主要源泉。他改编过很多祈祷词、赞美诗,把宗教的箴言、训诫等用于自己的文

学创作中。他的小说《驿站长》就是对《圣经》故事的仿构,其中的人物原型取材于《新约·路加福音》表达“小人物”的救赎主题。在哲理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中,他对人们的劝诫“不要悲伤、不要愤怒”(普希金 2008: 188)看似一种生活态度,实则其中蕴含以和谐为宗旨的“聚和性”思想。讽刺喜剧大师果戈理(Гоголь Н. В., 1809 - 1852)笔下的人和事也无不体现出东正教精神。其早期的作品《塔拉斯·布拉巴》尽管描绘大量血腥的战场,但歌颂的都是聚和性意识所弘扬的爱国精神。

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中,尘世的幸福往往微不足道,人必须接受苦难的磨练并自我净化,才能获得精神的复活,得到永生,这种思想深刻地反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1825 - 1881)、果戈理、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 Л. Н., 1828 - 1910)等的创作中。在陀氏的小说《罪与罚》中,主人公拉斯科尔尼夫在杀了万恶的高利贷者后,遭受一系列的精神折磨,最终受到圣经的感召去自首,从而获得精神复活。小说另一主人公索尼娅也是在经历过极度困难与痛苦后,在基督的关照中才迎来重生。托尔斯泰因自身信仰的问题而被东正教会剥夺教籍,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骨子里的“聚和性”情结,以至于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他塑造过一个个契合“聚和性”意识的爱国精英。总之,这一时期的作家笔下都是一些充满博爱、救赎、团结和谐的聚和性精神的形象。而“白银时代”初期的文学创作也继承“黄金时代”的这一传统,在象征主义大师梅列日科夫斯基(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 С., 1865 - 1941)的作品中,“历史长篇小说和诗歌常常令人惊异地混合在一起,……它们满怀为了人类和宗教而救助俄罗斯的伟大目标,切近斯拉夫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Ольга Матич 1999: 107)。而另两位象征主义文学家——别雷和勃洛克的作品,如前者的《基督复活》和后者的《一个多神教徒的忏悔》《十二个》,仅从作品名称就可管见其对俄罗斯人文传统的关注与承袭。而这一体现为“自由—自律—博爱”的辩证统一的聚和性精神恰恰与俄罗斯民族主流价值观所提倡的仁爱、团结、和谐、爱国等品质高度一致。换言之,这也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中的“聚和性”意识与俄罗斯民族主流价值观同构的内涵与实质。

2 对人性的书写与评判:同构的方法与路径

正如爱德华·赛义德(E. Said)所断言,国家、民族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叙事问题(赛义德 2003:

3)。长久以来,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很多经典之作作为俄罗斯“民族身份”和主流价值观构建的主要来源,试图通过文学叙事实现建构民族自觉意识的目的,也体现聚和性精神与俄罗斯民族主流价值观的同构。

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有一段关于主人公奥涅金和塔吉扬娜情感互动的描述。最终塔吉扬娜虽然仍爱着奥涅金,但还是拒绝他的追求。这里,与其说她是为了维护将军丈夫的面子,倒不如说她是遵循俄罗斯传统的道德准则。在这部小说中,也有奥涅金在高加索漫游时发出的救赎祈祷“无论命运之神的手把我安排在哪片无名的小地方,无论在哪儿,无论我卑微的方舟被命运漂到哪个方向,无论它让我晚年在哪度过,无论坟墓将在哪里等我,我在我的心中,到处,到处,都要为我的朋友们祈福!”这恰恰是一种悲怜他人、甘愿为集体舍却“小我”的聚和性意识的体现。(普希金 2014: 419)

果戈理在《死魂灵》《钦差大臣》《外套》等小说中,借助对“小人物”的同情,宣扬“聚和性”意识观照下“博爱怜悯”的人道主义。这种对人性的书写与评判在屠格涅夫的作品《猎人笔记》《木木》等和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套中人》《一个官员之死》《变色龙》等中也得到展现。而且,屠格涅夫笔下的《贵族之家》《阿霞》《前夜》等作品里的女性都是道德力量的化身,她们可以溯源至具有典型俄罗斯传统道德精神的塔吉扬娜。《罗亭》中的罗亭与奥涅金、毕巧林等一样,是受过良好教育,却因反感贵族生活而产生深刻反省的“多余人”的形象。不过,罗亭是一个胸怀远大抱负、思维灵活、言辞犀利的年轻人。他之所以被杜勃罗留波夫等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首先称为“多余人”,是因为他貌似只尚空谈而无革命行动力。其实,“罗亭一生都在行动着。不错,罗亭的特点是他的雄辩,但这并非‘空谈’,而是与他的思想和行动统一的。只是他没有像杜勃罗留波夫所向往的那样进行‘革命斗争’,也没有取得世俗眼光中的伟大功绩。然而,正是这种不断行动而又没有‘成就的存在方式,恰恰契合东正教的苦修精神’”(王志耕 2017: 93 - 94)。

在《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托尔斯泰塑造出“自我发现原罪”,从而用自杀来实现自我救赎的安娜和不断忏悔、拯救他人和自我的聂赫留朵夫。其“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所形成的苦难意识和救世意识与他对国家民族何去何从的探索相关,也与俄罗斯“聚和性”理念所

倡导的内省意识有关,是作家强烈的民族意识的体现。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代表各种人物声音的“复调”和“狂欢化”场面,揭示“聚和性”的思想问题,使善与恶、罪与罚、爱与恨、意识与无意识、磨难与自由等体现俄罗斯性格“二律背反”的问题在他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聚和性”意识既影响小说的立意,也影响小说的艺术结构。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集中表现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东正教叙事传统。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经典小说都通过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和对作品中时代事件所彰显的人性的书写与评判,来反映出“聚和性”意识与民族主流价值观的同构。

3 文化自觉:同构的精神根基

“聚和性”意识作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创作的源泉和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核心,其所蕴含的“文化自觉”意识是俄罗斯文学经典创作长期秉持的一个重要原则。“文化自觉”,即民族文化自觉,用费孝通的话来说,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文化自觉”既要有“自知之明”,同时又要了解其他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关系(费孝通 1997: 15)。

“文化自觉”亦即民族自我意识。在俄罗斯历史上,面对西方文化的风起云涌,斯拉夫派高举民族自我意识的旗帜,主张以俄罗斯民族精神为内核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这种思想的发源最早可以追溯至俄罗斯古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伊戈尔远征记》。正如利哈乔夫所言,“《伊戈尔远征记》是作者以民间诗歌的形式创作出来的,因为他自己也是靠近人民的,是站在民族立场上的,他所创造的民间诗歌形象与其民族观念息息相关”(Лихачев Д. С. 1998: 401)。《伊戈尔远征记》尽管也体现出一种精神的自我救赎之美,但它向我们传达一种高度自觉的民族精神,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俄罗斯文学第一部经典。在其后近千年俄罗斯文学史上,“文化自觉”更多地体现为作家对民族自我意识的有意识表达。这不仅反映在许多斯拉夫派作家的创作中,而且也反映在弘扬爱国主义的十二月党人文学和不同时期的经典战争文学中。其中包括脍炙人口的普希金的《致恰达耶夫》《拿破仑》以及后来20世纪肖洛霍

夫的《静静地顿河》、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

可以说,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经典无不深刻地体现着俄罗斯特色:不仅时空是俄罗斯的,人物性格是俄罗斯的,更重要的是作品蕴含着俄罗斯民族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即“文化自觉”。实际上它是一种民族文化认同的构建,正是这种构建在“聚和性”意识与俄罗斯民族主流价值观之间架起桥梁,成为二者同构的精神根基。其目的并不在于使俄罗斯文学仅仅能够传达俄罗斯本民族的东西,还更在于使它能超越本民族的界限,走向世界,并对世界产生影响。

4 “弥赛亚”:同构的精神诉求

俄罗斯的“弥赛亚”观念,又称“救世与使命意识”,确切地说,是一种对于世界的使命感,它来自“神圣罗斯”的民族认同和自豪感。“聚和性”意识在秉持“自由的统一”和“多样性的统一”原则的前提下,宣扬博爱、宽恕与团结,成为实现“弥赛亚”观念的基础。在俄罗斯文学经典中,体现“弥赛亚”信念的书写俯拾皆是。

普希金的著名诗作《致恰达耶夫》极为典型地展现出由“弥赛亚”信念所产生的“神圣罗斯”的自豪感和爱国精神:“我们的心焦灼不安,我们经受着宿命势力的重压,时刻听候着祖国的召唤。我们忍受着期待的煎熬,切盼那神圣的自由时刻来到,正象风华正茂的恋人,等待忠实的幽会时分。趁胸中燃烧着自由之火,趁心灵向往着荣誉之歌,我的朋友,让我们用满腔壮丽的激情报效祖国!”(普希金 2014: 78)。果戈理的《塔拉斯·布拉巴》同样展现出这种情怀:“罗斯啊,罗斯!我看得见你,我从美丽奇妙的远方眺望着你!……我心中充满对你的无限向往”(Гоголь Н. В. 1912 - 1913: 107)。而且,他在把这种深沉的情怀嵌入许多作品时,总能很自然地流露出他对“博爱”“伙伴精神”的主张,这种爱正是他的“聚和性”意识使然。正是出于这种爱,他把忧国忧民作为己任,时刻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与前途。

托尔斯泰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史诗巨著《战争与和平》则以更为宏大的场面和复杂的叙事展现出俄罗斯人民在1812年卫国战争中焕发出来的惊人的力量和爱国热情。被士兵亲切地称为“我们老爷”的皮埃尔从俄罗斯人民的代表普拉东身上看到真正的美德:宽容、通达、忍耐和爱。作家通过伯爵小姐娜塔莎善良热情的民族气质,

表达《战争与和平》中“和平”一词的意蕴,体现出高度的“聚和性”意识。其核心正是娜塔莎在教堂祈祷时感悟到的“全体一起、没有等级之分、没有仇恨、被博爱联系在一起”,而这也正是作家毕生弘扬的俄罗斯“人民的思想”(任光宣等 2010: 157)。

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中展现出的这种“弥赛亚”信念并非一种仅限于俄罗斯本民族和国家的使命感,它还是一种关乎全人类的世界使命感。在这种使命感昭示下,“聚和性”意识所提倡的“包容”“博爱”“和谐”“团结”的精神是包孕全体民众的,即希冀普天之下的所有人都被融入一个平等的整体。

5 结束语

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是当时俄罗斯社会现实生活的形象反映及其民族精神的艺术弘扬。而其中,“聚和性”意识与俄罗斯民族主流价值观的同构不仅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与社会现实对话的产物,更是对俄罗斯历史上民族精神与社会发展相互影响的艺术反映。它源于俄罗斯社会现实,但它的意义更在于揭示民族精神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聚和性”意识高度关注人的主观世界,引导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Бердяев В. Н., 1874 - 1948)指出,俄罗斯民族性格具有神秘性、不可知性和恒定性,即一种不随历史环境变化而变化的特性(Бердяев Н. А. 1910: 51)。此外,俄罗斯人身上“二律背反”的矛盾性和偏爱“精神漫游”而轻视实践的特点都是俄罗斯民族性中的消极因素。这是制约俄罗斯民族历史前进的文化原由,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弥赛亚”信念只能成为“乌托邦”。

通过分析19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中“聚和性”意识与民族主流价值观的同构,我们得到的启示是,“精神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是民族和国家赖以发展与强盛的前提。在多元文化冲突的今天,增强民族文化自觉,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并提升民族精神性对我们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念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爱德华·赛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四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 北京大学学报, 1997(3).
- 弗兰克. 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M]. 北京: 学林出版社, 1999.
- 洛斯基. 俄国哲学史[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 普希金. 普希金诗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普希金. 叶甫盖尼·奥涅金[M]. 广州: 广东省出版集团, 2014.
- 任光宣 刘涛 任丽明. 俄罗斯文学的神性传统——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基督教[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王志耕. “漂泊”与“禁忌”: 屠格涅夫小说的基督教命题[J]. 外国文学研究, 2017(4).
- Бердяев Н. А. Духовный кризис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СПб., 1910.
- Бердяев В. Н. Душа России//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Изд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90.
- Гоголь Н. В.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ое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Н. В. Гоголя в восьми томах, т. 6, М., 1912 - 1913.
- Есаулов И. А. Категория соборности в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зд.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5.
- Лихачев Д. С.,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и культураего времени. СПб: Изд. «Логос», 1998.
- Миненков, Г. Я. «Соборность.» Новейший философ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ст. А. А. Грицанов. Минск: Изд. В. М. Скакун, 1998.
- Ольга Матич(США),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третьего завета и традиция русского утопизма, 1999.
- Хоружий С. С. Хомяков и принцип соборности//Вестник 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Париж — Нью-Йорк — Москва, 1999.